

手机这玩意真是个奇妙的东西。对于我这样的中国人来说，手机的印象最初和香港的黑社会联系在一起，很大，像一块可以用来砌墙的砖头，只有黑社会老大才会使用，我们称之为“大哥大”。

手机很快就普及了，人手一部，这个发展过程快得惊人。再后来，手机上的阅读就普遍了，手机不再是黑社会老大的专利，不再是仅仅用来聊天说话。手机的阅读功能，已经超越了炫富和通话。有几张图片很能说明问题，在中国十分流行，一张是抽鸦片，一张是看手机，姿势都差不多一样。

为了改变这种现象，中国的各个城市都有读书节，都举办形形色色的读书活动，号召民众读书，不遗余力地宣传读书的意义。中国人曾经是最喜欢读书的民族，古语说得好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我们相信读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。可惜这些年的行情完全变了，我们的媒体上经常会表达出这样一种遗憾，那就是中国人好像都放弃了阅读，与其他国家的民众相比，反而是外国人更乐意阅读。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，说俄罗斯人躺在草地上读诗歌，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在地铁上看小说。

当然不是这样，事实的真相显而易见，全世界都在低着头阅读手机。俄罗斯人、法国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，他们和中国人一样，都在目不转睛地看手机。这是不可阻挡的一个潮流，算不上什么好事，也未免就是了不得的坏事，它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。因此，只是讨论应该不应该在手机上阅读，完全没有意义，可以进行一番讨论的也许只能是，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，究竟能读到一些什么。

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鲁迅曾经说过一件事情，他母

【灯下碎语】

## 叶兆言：阅读是自由的

亲作为一名家庭主妇，作为一名著名作家的哺育者，也喜欢看些小说，不过从来不看 he 写的那类小说。鲁迅的小说曾经很流行，在当时是文学青年的《圣经》，而她看的小说同样也很流行，在报刊上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。同样是小说，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，有着不一样的品质。在评论家眼里，在文学史上，鲁迅母亲看的那些小说可能都是低俗的，不入流的，但是鲁迅先生并没强求母亲提高文学口味，强求她去读自己写的文字，强求她去读 he 心目中认定的优秀文学作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鲁迅清楚地知道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写作是自由的，阅读也是自由的，人有选择自己要读什么的基本权利，即便是儿子，也没权利强求母亲去读什么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所谓为读者写作，有时候就可能非常可疑，就可能是一句十足空话。迎合读者，读者要读

什么，我们作为写作者就为他们写什么，完全有可能会变得非常不合适，非常不正确。毫无疑问，作家必须要有理想，他永远都是在为潜在的读者服务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作者和读者都是在寻找，都在寻找他所认同的东西。作家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认同，读者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认同，大家各司其职，大家各取所需。换句话说，作者和读者的关系，有时候就像鲁迅母子，母亲要读她想读的东西，而儿子只能写 he 想写的东西。

我离开大学以后，在出版社当过编辑，深知读者趣味的不可捉摸。对于写作者来说，很多事说起来容易，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。一方面，我们不知道读者想读什么，觉得自己很努力，在充分地 为读者着想，实际上，更可能是盲人摸象，是想当然。我们常常会陷入到自以为是的困境中，我们盲目地生产，结果读者根本不接受那些为他们定制的产品，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理睬我们。我们的辛苦努力，最终变成了一个个笑话。另一方面，有时候，我们确实可以聪明地知道读者需要阅读什么。出版社因此可以赚钱，因此有了良好的经济效益。明知道在文学创作中，流行和时髦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，但是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不可能免于利益的诱惑。

时至今日，在中国搞出版还是个赚钱的好买卖，尽管大家都在抱怨，纸媒的辉煌时代已不复存在，都在抱怨手机阅读给出版社的利益带来致命打击。

今年8月8日，中国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权威的《2015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》，这份报告有个非常重要的结论，就是“2015年纸书的销售相较于2014年，不但没有下降，反而有所增长”。我对这个数据不感兴趣，感兴趣的

是它提供的另外一些数据，譬如“数字出版”增加了百分之三十，这个数据与手机阅读是可以互动的。又譬如期刊减少了百分之五点二一，报纸减少了百分之十点二七。而且，这些数据说的是2015年，甚至是2014年，2016年又会怎么样呢？当然还是应该增加的继续增加，应该减少的继续减少。

最后还是回到手机阅读上，首先，手机阅读和吸食鸦片没有什么可比性，并不像媒体上认定的那样有害，它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，很多东西都可以让人上瘾，都可以让人身陷其中不能自拔。其次，手机阅读并不能表明读者的阅读兴趣有什么本质改变，中国人有句俗语，什么人玩什么鸟，手机上确实有很多无聊信息，无聊是因为有无聊的需求，有无聊的供给。手机屏幕只不过 是更加形象更加生动，同时又是更加数据化地演绎了人们的阅读生态。它代表着我们有可能更快地读到你想读的东西，它更方便，也更直截了当。

不少年轻人跟我谈起过网络小说，他们对这些小说表现出来的热情，远比阅读世界名著更大。很显然，我们已经无法避开网络时代，一位法国作家非常认真地告诉我，他在手机里存了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，觉得无聊时，会很随意地看上几页。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，而且还相信，一定会有人用手机来阅读《红楼梦》，阅读唐诗宋词，阅读鲁迅的著作。但是说什么也不相信，我不相信在网络时代，优秀的文学作品会没有立锥之地，不相信文学会因此就死亡了，就不存在了。我相信，如果阅读仍然是自由的，必然会有人选择更优秀的文学，如果写作仍然是自由的，必然会有人写出更优秀的作品。

（本文为叶兆言在韩国东国大学的演讲，有删节）

博  
園

道光帝用征询的口气问林则徐：朕想任命你为钦差大臣，让你代表朝廷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，广东水师也由钦差大臣兼归节制。很显然，几次谈话下来，道光帝的态度已经很明确：鸦片泛滥“事在今日，未能断其祸根，毕竟有外国商人私带鸦片。若能严治他们，将夹带的鸦片焚烧净尽，令不敢输入我国，纵使国中尚有所存，久之必吸食竭尽，其害自灭”。于是决定派出钦差大臣，把禁烟重点放在查禁广东海口走私上。几次临朝，道光帝对林则徐相当满意，他给予林则徐紫禁城骑马、坐椅子轿的恩遇，目的是想给朝臣们这样一种印象：林则徐是拥有特别权限的人物，是皇上信任的人。他要向朝中的官员们显示林则徐的权威。

林则徐八次被召见，道光帝都让他跪在软毡垫上。一般的臣子可都是跪在地上的，这当然又是一种恩宠。从紫禁城骑马、坐椅子轿到跪毡垫，他已经让同僚们够嫉妒了，现在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，全权代表皇帝到广东禁烟。朝廷文武大臣谁能享受这种恩遇？阅遍大清历史，恐怕也只有林则徐一人了。

（摘自《晚清外交七十年：两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碰撞》，李书纬著）

【书中风云】

## 潘柳黛差点把张爱玲骂哭了

苏青、潘柳黛、张爱玲、关露，据传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文坛的“四大才女”，其中潘柳黛与张爱玲发生了一段笔墨官司，且纠缠数十年而不休。

潘柳黛本名思琼，别名柳黛，1920年2月12日生于北京市东城区一个旗人家庭。1940年，潘柳黛到了南京，在《京报》副刊当誊稿员，因文笔出众，不久转为记者。随后潘辗转于几家小报当编辑，并给各小报写专栏，“享受着如同女明星般的瞩目”。

所谓“四大才女”的说法，应是此时流传开来的。

然而，据学者祝淳翔考证，“四大才女”可能是潘柳黛的自炫，当时小报确有四女作家之说，有时指丁芝、张宛青、潘柳黛、苏青（因四人都曾离过婚），很少有人将潘柳黛和张爱玲并列在一起。原因是：“潘柳黛的作品，芜杂荒乱，野气冲天，而又野而不悻，就觉力薄，实在是不能与张、冯（苏青本名冯和议）并论。”

潘柳黛一生严肃创作不多，代表作是1945年出版的《退职夫人自传》，被誉为“（与）中国女性主义小说经典的苏青名作《结婚十年》堪称‘双璧’”，潘柳黛还有一本少有人知的长篇小说《一个女人的传奇》（可能写于上世纪50年代），两本小说均展现出女性主义视角。

张爱玲曾借苏青的话来评价潘：“这种女人，腰既不柳，眉也不黛，胖得像箩筐，装得倒是风情万种的样子，其实骨子里俗得很。”（后半句可能是张自己加上的，未必是苏青的意见）对于超重，潘柳黛自己倒是看得开，曾说：“有人看见我名字，总以为我一定是瘦比黄花的样子，我说那是因为他只看到柳枝，没有看到柳树的缘故。”

潘柳黛的写作“以多幽默感和热情横溢胜”，常夹杂不必要的刻薄词句，这从她得罪张爱玲的那篇《论胡兰成论张爱玲》中便能看出来。

1944年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三卷（五六月出刊）上，胡兰成写了《论张爱玲》一文，提到张爱玲的“贵族血液”，赞美她的创作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。

潘柳黛反问：胡兰成何时“横看”和“侧看”张爱玲了？暗示二人关系不正常。对于“贵族血液”，潘柳黛则嘲讽道：张爱玲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，这种关系就像太平洋上淹死一只老母鸡，吃黄浦江水的上海人却自称喝到了鸡汤一样。文章化名“真西哲”，因胡的文章说张爱玲的个人主义可与西哲苏格拉底、卢梭相提并论。

在苏青提醒下，张爱玲才注意到这篇文章，读后“一时气得浑身发抖……差点流下眼泪”。

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？潘柳黛的解释是：“当时我只顾好玩，说得痛快，谁知以后不但胡兰成对我 not 叫应（照应的意思）了，就是张爱玲也‘敬鬼神而远之’不再与我轧淘（交朋友之意，吴语）。”

而张爱玲的解释是，一次潘柳黛和苏青预约上门拜访张爱玲，张特意穿了件柠檬黄露臂晚礼服等她们，以示郑重，可二人迟到了5至10分钟，门铃响时，张爱玲对佣人说：“秦妈，告诉她们，本小姐现在不会客。”潘柳黛站在前面，看到了张爱玲，便问她是不是有贵客，但张还是请她们吃了闭门羹。半个月后，苏青打电话给张：“你不好好接待潘柳黛，遭报应了。”苏青所说的“报应”，就是潘柳黛的那篇文章。

从潘柳黛的文章中可以找出蛛丝马迹，她在1975年发表的《记张爱玲》中，曾写道：“她（指张爱玲）在上海时，又一度攻读于圣约翰大学，虽然没有毕业，但教会学校的神髓却被她领会到了……她的时间观念，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。”

恶骂张爱玲，或可从潘柳黛个人经历的角度去理解，潘因专栏成名，因为她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，话说得越绝对越激烈，得到的回报就越丰厚，这使潘对文字的“社会意义”产生误解，将四处树敌、人身攻击当成批判。

（摘自《北京晚报》，文/唐山）

道光帝决心禁烟，林则徐的奏复使他看到了希望，于是他决定召见林则徐。从1838年12月27日到1839年1月3日，道光帝先后召见林则徐八次，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，两人所谈的话题都是禁烟。

1838年11月13日，林则徐接到道光帝要召见他的谕旨。虽然还不知道皇上的真实意图，但垂询鸦片问题却是必然的。所以接到圣旨后，他让属下将各省有关禁烟章程拿来一件件查看，凡有借鉴价值的，都抄录备用。

12月26日，林则徐到达北京。他进京的第二天早上就得到了道光帝的召见。28日，道光帝又召见了 he，谈话的主题同上次一样，仍然是禁烟。在询问完这个问题后，道光帝问林则徐：“能否骑马？”这个问题让林则徐不知如何回答。应该说，林则徐是会骑马的，就像今天驾车一样，不过驾术不精罢了。林则徐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，道光帝也不知道 he 到底会不会骑马，只好继续询问 he 感兴趣的问题。这样两人的谈话又进行了个把小时，林则徐磕头告退。 he 回到朝房歇息时，接到谕旨：准许林则徐紫禁城内骑马。

林则徐受此恩宠，十分高兴，能够享受在紫禁城内骑马可是极大的政治优待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紫禁城骑马、坐椅子轿、跪毡垫

## 道光连续八次召见林则徐

员就费劲了。于是开明的康熙皇帝恩准那些年老的官员在紫禁城内骑马上班，实是皇上对下属的体恤。不过这项规定，只限于朝中大臣，外放的地方官极少有这种待遇。林则徐进京面圣，作为一个外放的汉官，却享受到了这种待遇，就连 he 自己都说：“外僚如此，尤异数也。”

得了这样的恩遇，第二天一早林则徐受宠若惊地骑着马上朝了。虽然他的骑术不怎么样，但还是引来同僚的一片羡慕和嫉妒之声。这些林则徐同样也感受到了。俗话说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与这种殊荣如影随形的是同僚的嫉妒，这后来给 he 的人生带来了悲剧。林则徐并不是一个张扬的人，但道光帝的这份恩宠，君命之下，不得不行。召见时，两人继续讨论禁烟问题。最后，皇上问他，骑马怎么样，林则徐只好如实回答：“臣不习惯骑马，还是请圣上恩准臣步入内觐见吧。”想不到林则徐的这番回答却得来更大的恩宠，道光帝说：“你不习惯骑马，可坐椅子轿。”天子再次降恩，林则徐哪能不知好歹，只得叩头谢恩。后来的四次召见，林则徐都是乘椅子轿上朝的。

12月31日，林则徐坐着椅子轿上朝了，这是道光帝第五次召见 he。在这次召见中，

在当时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多是那些朝中老臣，按朝廷惯例，朝廷官员上朝要沿着指定路线行走。偌大的紫禁城，要走到金銮殿见到万岁爷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对于年轻力壮的官员来说这不算什么，但对于那些年老的官